

中共八大及其前后不提 “毛泽东思想”问题述论

□李合敏

(中共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 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在党章中作了明确规定。但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却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甚至在整个1950年代党的文件和媒体中也都难以见到“毛泽东思想”一词。这既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集体做出的决定,更是毛泽东本人自1948年冬以来提出并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固然与其谦虚谨慎、笃信马列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民领袖风范和对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尚未形成的清醒认识有关,但更是基于对“国际局势”的科学把握。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共八大;社会主义建设;“国际局势”

[中图分类号]A84;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71(2012)03-0067-11

众

所周知,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确立的。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必然选择,更是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的迫切需要^[1]。首先,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20多年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并对其进行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通过延安整风中对王明错误的批判和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仅从切身体会中而且从理性上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中央因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发展,承认并支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特别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解放”,不再受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共的

指挥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党,从而完全可以从中国国情出发去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可以公开提出以自己领袖名字命名的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历史决议’提毛泽东思想就有对着苏共的意思。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在苏共、共产国际帮助下产生的,这一方面给我们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我们党造成了许多困难,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如果不经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确定了。‘历史决议’反映全党要求,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设想,如果不提,就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因为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2]。再次,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宣扬“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封建独裁思想,企图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为争取民心,凝聚党心,打退国民党在思想战线上的进

[收稿日期]2011-10-21

[作者简介]李合敏(1953~),男,河南内乡人,中共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攻,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自己领袖及其思想主张的宣传。还有,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互相处于分割状态。为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必须加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必须高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毛泽东思想。正因为如此,当王稼祥在1943年7月5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之后,立即为全党所接受。1945年6月,党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3];党员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4]。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不仅在当时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前进、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革命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艰巨复杂的社会建设事业更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并且,伴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人们更加衷心拥戴毛泽东,更加信仰并自觉践行毛泽东思想。然而,在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新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新阶段的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无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的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还是各代表的发言、民主党派的祝词、外国党的致词贺电以及各类文件,均未提“毛泽东思想”一词。特别是,早在“1955年10月20日,在由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八大新党章修改稿初稿中,已经没有七大党章中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了。在初稿之后,新党章又修改了5次,才向八大提出修改稿。在这5次修改中,也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提出加进七大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部分。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审阅后批示:‘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2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七大党章中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分别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6];党员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7]。不仅如此,在八大前后

的整个1950年代的党的文件和媒体中,也都难以见到“毛泽东思想”一词。这一现象,尤其是在八大党章这一党的法规中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乃至今天,都难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

中共八大及其前后的文献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是偶然的。“毛主席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早在建国前夕就已萌生了。”^[8]据文献记载,毛泽东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一词,最早是在1948年11月21日。当日,他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提出将“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9]。同年12月下旬,他在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草案)》时,将其中“在青年团员与青年群众中,广泛地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教育”,修改成“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地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國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总则中的“它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改成“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团员”;并把《草案》中另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作了类似的修改。12月27日,他再次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冯文彬,提议经过上述修改的两个文件是否考虑在中央会议上通过,还说“似以通过一下为好”。毛泽东的两封信,是向中央书记处的正式通气。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两个文件分别于1949年1月2日和3日由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刊载^[1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坚持了自1948年冬起不用“毛泽东思想”一词的思想。1950年5月,《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出版工作。同年8月19日,他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中,并提出须对其“作若干小的修改”。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而且对这个公开发表稿作了几点重要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

去，有些就是毛泽东在审定过程中亲笔删改的。如在第一节讲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后，删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语；也有将“毛泽东思想”删后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这样，发表稿通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与此相反，发表稿中“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11]。

1951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为纪念建党30周年写的长篇论文《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在报上发表并出了小册子。毛泽东得知后认为不妥，指示：“不要用这个书名，我们中国同志不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我们要谦虚，我们执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2]据此，该文英文版改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其后国内再版，也改用此名，从而回避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1952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批转中宣部的一份报告中，加写了一段话，肯定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3月24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文，称“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并要求中宣部理论宣传处编辑的《学习》杂志在1952年第4期转载此文。此文在被《学习》杂志转载时，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13]。显然，毛泽东对此文“缺点”的修改，就包含着删去原来题目中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字。同年9月25日，毛泽东对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将“这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二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并特别强调：“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4]

1953年，毛泽东在审阅文电时，更多次对出现“毛泽东思想”字样的文电作了修改和批示。4月

10日，他在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会的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上批示，学会章程和宣言中“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此字删去”^[15]。5月24日，他在军委军训部长萧克关于报送内务条令等文件的报告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16]6月4日，他在彭德怀报送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2期教育计划稿上作了3处修改，其中一处就是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5个字删去^[17]。8月14日，他在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罗贵波、副团长邓一凡的电报稿上批示：“第三条中的一句，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电报稿第三条中这句话的原文是：“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毛泽东审阅时将这句话中的“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18]。

1954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呈送的一个报告上批示：“‘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19]同年12月5日，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传阅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就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问题下发了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其中，最后一句是毛泽东在审阅通知稿时加写的。中宣部这个通知下达之后，有的省委曾对通知中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电询中宣部“毛泽东同志”是否为“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于12月25日复电说：“原文系同志，并

无错误。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20]按照中宣部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所作的规定,除了讲解历史文件以外,一般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字样,而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字样来代替。

从1955年起,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八大的筹备工作,特别是亲自指导并具体参与了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和八大召开前的再次建议,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中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八大党章虽然未提“毛泽东思想”,但是它在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的同时,特别强调:“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21]就是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形成和确立的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仍然要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要在实际上具体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且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

在八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内公众场合基本上没有公开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五十年代末,赫鲁晓夫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华逆流;在国内,我们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庐山会议后,在一些中央负责人的文章和讲话中,重新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林彪、康生则乘机制造混乱,肆意进行歪曲。”^[22]但是,中共中央并未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直到196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对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请示的批复中仍然指出:“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不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

提,以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是两回事。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23]同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24]至于“毛泽东思想”一词公开在公众场合出现并大量使用,则是1960年代初以后的事情。

“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25]

综上所述,中共八大及其前后不提“毛泽东思想”一词,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而且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并坚持的意见集体做出的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当然主要是取决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反而更加深入人心。“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论是党内还是在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26]

三

如前所述,从建国前夕到整个1950年代(当然包括党的八大)在党的正式文件和媒体中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基于党中央的决定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但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更反对提“马恩列斯毛”呢?对此,刘少奇、周恩来和胡乔木曾从不同侧面作了解释:

“八大不提,因为当时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方针政策还有待于实践检验,还不成为科学体系。因此经中央讨论毛泽东同志同意,八大党章上没写毛泽东思想。”^[27]“八大党章中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28]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

生。这个想法是毛主席删去‘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在于毛主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29]这些论述告诉我们，我们党和毛泽东之所以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固然与毛泽东谦虚谨慎、笃信马列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民领袖风范和对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尚未形成的清醒认识有关，但更是对当时我们党和国家所处国际环境的科学把握，进而对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抉择。

（一）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真理

党的七大前后，尽管全党和根据地军民发自内心的地拥戴毛泽东，尽管毛泽东顺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而同意以他的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但他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和十分谨慎的态度，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早在1943年，当一些同志酝酿为毛泽东祝寿（50岁），并借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时，他闻知后即致信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并强调：“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30]1944年，他不仅告诫全党要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1]，而且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2]1945年，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七大上，他反复强调“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33]。1948年8月，时任华北大

学校长吴玉章打算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知道后，当即致电吴玉章：“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34]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3月，针对因为胜利党内可能滋生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5]“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36]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继续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严谨作风。他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1956年9月党的八大开幕词中一再指出：“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37]“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38]毛泽东的心路轨迹表明，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因而，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当然要受到他的否定。

（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始终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枝叶”。如果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或者将毛泽东思想称作“毛泽东主义”进而将“马恩列斯毛”并列,必然会引起重大误解。新中国建国前夕,他不仅在致吴玉章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而且在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进一步系统、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39]

1951年7月20日,毛泽东再次对“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作了科学界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

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40]1954年,继中宣部于12月5日下发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之后,毛泽东又于12月19日特别指出:“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41]1956年1月,当有的同志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时,毛泽东不仅表示不同意这种意见,而且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筹备八大时,毛泽东再一次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泽东思想”^[42]。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持,八大不仅没有“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而且连“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提。

(三)我们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43]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无论是面对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与成就,还是面对党和人民对他的高度颂扬,始终保持着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居功不傲的品格,坚持着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严守着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自觉地、明确地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建国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不仅使中国人民更加衷心地歌颂毛泽东,而且使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毛泽东无比推崇。但是,毛泽东却仍然十分谦虚谨慎,坚决反对对他的歌功颂德。在建国之初,他不仅坚决谢绝了有代表提出给予他以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坚决不同意在北京等地铸毛泽东大铜像,而且开始关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1953年8月12日,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不仅强调“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44],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因而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而且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

列斯平列的6条规定。1954年4月，他针对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开始批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强调《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以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45]。同年，他在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不仅否定了有人关于将其定名为“毛泽东宪法”的提议，而且在审阅宪法草案时删去了过分颂扬他的条文，坚称“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46]。1955年3月21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47]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并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深刻分析了个人崇拜这种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性，特别是总结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揭示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提出了防止和减少个人崇拜的措施，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鲜明态度。毛泽东特别指出，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之所以在他后期的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以致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48]与此同时，鉴于苏联的教训，他进一步重申，不要过分颂扬个人，突出个人，不要用人名作地名，不准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他还提醒党内一些同志不要因为取得执政党的地位而产生骄傲情绪，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作风，

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毛泽东的上述重要思想，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党的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49]在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更明确指出：“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因此，我们党始终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对个人崇拜。为了防止个人崇拜的发生，我们必须“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50]。当时的形势，特别是早在筹备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再次批示在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泽东思想”，因而党的八大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四）“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毛泽东历来认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51]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除了前述的原因之外，还在于“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并被“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

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并且，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和完备，“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等”^[52]，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可以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科学理论体系。

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53]。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事业中只能在探索中前进，甚至会遭受曲折。对此，毛泽东早在“进京”不久的1949年6月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54]建国后，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更深刻认识到仅凭过去搞民主革命的经验是不行的。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时，他就明确表示《毛泽东选集》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而在当时，所谓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只能是学习乃至照抄照搬苏联的建设经验。到1956年，尽管我们党深感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弊病很多，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已经开始认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产生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刘少

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一些社会主义经济观点，但毕竟只有六年的实践，经实践检验又能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还是初步的，还没有形成为可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熟的科学理论体系。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谈到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时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民主革命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而“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55]。其后，他又再三指出：“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56]“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57]直到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58]正因为毛泽东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对出版社会主义时期著述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

始终持谨慎态度，使编辑多次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在他生前未能出版。也正因为如此，八大党章乃至整个20世纪50年代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五）“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任何国家革命的胜利与巩固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但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及其主导的共产国际在很长时间内却对中共特别是其领袖毛泽东一直持有偏见。他们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横加干涉而使中国革命屡遭挫折，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努力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不完全听从他们的旨意，而导致他们的疑虑，“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59]。“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60]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子，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契机并根据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并在党的七大上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更使苏共大为不快，他们“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这又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注意。1947年9月，为交流经验和协同行动的联合机构——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开始向苏共示好。1948年初，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主张“走自己的道路”，被斯大林视为“自作主张”和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而与其反目，苏共中央6月28日发表《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抨击南共领导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当年10月，南共又被开除出情报局。这些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因为1948年正值中国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亟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这当然要求必须同苏联搞好关系。为了消除苏共对中共的疑虑，进而弥合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赞同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并

对南共进行了谴责。8月15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坚决反对“毛泽东主义”和“马恩列斯毛”的提法。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预言：“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61]11月，毛泽东在给情报局机关刊物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论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在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盛赞“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谦称“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肯定“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62]，表明了中共对苏共在世界反帝阵线中领导地位的拥护。11月8日，刘少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63]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提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应当降温。

1949年1月底、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与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谈判时，明确提出了建国后希望得到苏联经济援助的请求。当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同样离不开“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64]6月30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65]积中国共产党的28年经验，我们“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66]，必须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新中国必须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并

且十分强大的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才能“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67],并争取苏联对我们经济上的援助。为了加强和发展中苏关系,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两个月之后即出访苏联,并签订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重要文件,为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争取外国援助,使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一系列的场合和文告中对苏共和斯大林均有赞颂之语,特别是毛泽东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大会上的祝词》和1953年3月9日为悼念斯大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最伟大的友谊》中,更充溢着对斯大林的颂扬。1957年11月,他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如果没有头,力量就会削弱。”^[68]

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不懈努力,苏共和苏联政府给予了新中国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消除苏共和斯大林的疑虑,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维护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局利益,为了维护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且即使某些违心的事情也不能不做。对此,毛泽东的两次谈话足可作为佐证。其一,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1949年12月16日访苏,当斯大林提出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

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69]其二,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70]至于我曾写过的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并且大多“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好”^[71]。这些沉重的话语既反映出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正确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际关系的高超艺术,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与苦衷:尽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引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但却遭到苏共和斯大林的怀疑,被视为“离经叛道”甚至“独树一帜”;尽管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成功访问苏联,斯大林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看法,并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历史成见和疑虑并未彻底消除;尽管“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但在中苏关系上“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72]。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然不会因为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刺激苏共,影响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失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援助。■

Discussion on No Men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before and after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LI He-min

(Henan Nanyang CPC Party School, Nanyang, Henan 473000)

Abstract: At the S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MAO Zedong Thought was set to be the guiding thought for the Party establishment, which was clearly stated in the Party constitution. But at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eld in 1956,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even during the ten years in 1950s, the words “MAO Zedong Thought” was barely seen in Party's documents and media. This is actually a collective decision made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 of MAO Zedong. It is also the promise made by MAO since 1948. MAO zedong's in which he insisted on no men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is not only reveals Mao's modesty, his firm belief of Marxism-Leninism, and his determined disapproval of personal worship, but also demonstrates his scientific and sensitive observ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MAO Zedong Thought; the S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参考文献】

- [1] 李合敏.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问题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0, (1): 116-126.
- [2] [8][11][25][29] 本书编写组.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29, 328, 329-330, 329, 328-329.
- [3] [4] 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A]. 选编组.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十六大)[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46, 48.
- [5] [10] 齐得平. 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若干情况[J]. 中共党史研究, 1996, (5): 73-75.
- [6] [7][21][49]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26日通过)[A]. 选编组.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十六大)[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61, 65, 61, 64.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下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397.
- [12][27] 李晓勇. 建国初期毛泽东为何不让提毛泽东思想[J]. 天中学刊, 2005, (1): 1-7.
- [13][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3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376-377, 563.
- [15][16][17][18][19][20][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4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192, 238, 243, 304, 473, 623-624, 484.
- [22][42]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 四十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J]. 红旗, 1981, (2): 31-36.
- [23][24][50] 邓小平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79, 283, 234-235.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1976)(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535.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下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79.
- [30][32][34]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212, 241, 303.
- [31][33]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948, 1027.
- [35][36][54][62][65][66]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38-1439, 1443, 1480-1481, 1357-1358, 1475, 1473.
- [37][41][46][47] 毛泽东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90, 387, 330, 391-392.
- [38][55][60][69][70][71]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17, 101, 42, 386-388, 119-120, 126.
- [39][61][64][67] 毛泽东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259-261, 146, 261-262, 344.
-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5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423.
- [43]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30.
- [44] 毛泽东选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96.
- [48][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6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62-63, 649-650.
- [51][56][57][58] 毛泽东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20-321, 72, 198, 302-303.
- [52] 刘少奇选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333-335.
- [5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817.
- [59] 周恩来选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02.
- [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年谱(1898-1969): 下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165.
- [72]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94-295.

【责任编辑 谢明俊】